

附件一：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基本情况	姓名	于宏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4 年 5 月 29 日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民族	汉			入学时间	2018 年 9 月									
	基层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攻读学位	硕士									
	学制	3			学习阶段	☒ 硕士 ☐ 博士			学号	220180917781									
	身份证号	1	3	0	7	3	2	1	9	9	4	0	5	2	9	2	7	3	4
申请理由	本人自入学以来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积极申报科研项目，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展现了兰州大学当代学子的青春风貌，展现了历史文化学院莘莘学子的奋进本色。 专业课成绩优异，多门专业课在 90 分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96，学术道德规范与形势政策，民族关系专题 93，民族发展理论 92，民族社会学 92，中国少数民族史 92。 撰写并发表 6 篇学术论文。①《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献疑九则，《陇东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②论元朝政府对阵歿群体的抚恤，《安顺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 期。③国家符号语境下的民族团结——以人民币发行演变为中心，《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④《新元史》勘误两则，《红河学院学报》2020 年第 3 期。⑤高考设立初期历史试题评述(1952—1965)，《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0 年第 7 期。⑥《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献疑一则，《兰台世界》2020 年第 8 期。 主持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公’研究生科研创新提升计划“《元史》蒙古族将臣传记考订拾遗”（项目编号：18LSZGB007）。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推荐意见	学科点负责人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情况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单位意见	经评审，并在本单位内公示_____个工作日，无异议，本单位申报该同学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现报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 学院、研究院主管领导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培养单位意见	经审核，并在本单位公示_____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批准该同学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0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成果公示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年级	培养层次	申报所用成果名称	正式发表时间	发表期刊名	署名情况 (n/m)	影响因子及分区（ 或期刊等级）	加分项
1	历史文化学院	于宏伟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2018级	硕士	1. 《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献疑九则	2020年1月15日	《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1	一般	
						2. 论元朝政府对阵歿群体的抚恤	2020年2月15日	《安顺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1	一般	
						3. 国家符号语境下的民族团结——以人民币发行演变为中心	2020年4月18日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1/2	一般	
						4. 《新元史》勘误两则	2020年6月8日	《红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1	一般	
						5. 高考设立初期历史试题评述(1952—1965)	2020年7月14日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0年第7期。	1/1	一般	
						6. 《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献疑一则	2020年8月6日	《兰台世界》2020年第8期。	1/1	一般	
						7. 主持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至公’ 研究生科研创新提升计划	18LSZGB007	《元史》蒙古族将臣传记考订拾遗			

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成绩单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年级: 2018级

专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学号: 220180917781

姓名：于宏伟

[illegible]

填表人:

学院盖章:

研究生院盖章:

学分总计: 31

资格审查结果:

研究生成绩管理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至公”研究生科研训练项目立项通知书

于宏伟同学：

您申报的《〈元史〉蒙古族将臣传记考订拾遗》课题，经过学院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现在正式批准为 2018 年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公”研究生科研训练项目。

项目批准编号：18LSZGB007。项目批准经费：3000 元。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 1.5-2.5 年。

“至公”研究生科研训练项目，取名自兰州大学至公堂，是面向我院研究生所设立的研究生科研提升计划系列项目之一，旨在助力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营造良好的学术创新氛围，搭建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8 年 12 月 8 日



兰台世界

LANTAI WORLD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认定学术期刊

● 2018 期刊数字影响力百强

● 辽宁社会科学优秀期刊



档案职业专题研究

Drupal和Bootstrap在档案信息网站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纯档案、泛档案与类档案的区别及综合利用

美国NARA胜任力模型的分析与启示

2020年8月

《《 研究探索 YANJIUTANSUO

- 051 明代皇史宬对档案的管理与保护.....张筠
055 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在档案文化传播中的运用研究.....范雨欣
058 增强现实技术在档案志愿服务推进策略中的应用研究.....黄佳慧
062 高校档案馆网站建设思考.....高珊
065 大数据时代的“档案+”思维.....贺兴义

《《 科学管理 KEXUEGUANLI

- 069 核电三维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杨茹 徐浩然 崔静华
073 声像档案管理对档案编研质量的影响及对策.....方军
077 完整性视角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管理工作.....冯严 潘岩
079 “互联网+”高校党建档案信息化管理研究.....邵亚伟
083 基于AIC系统的学生档案信息化建设.....沈玲

《《 开发利用 KAIFALIYONG

- 086 新时代校史编撰工作中口述档案的价值体现.....赵瑞红
089 “互联网+”时代档案著作编写出版创新与实践.....马燕婷
092 公共档案馆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金满银
096 校史档案视角下的北京联合大学生存发展之道初探.....文松
101 大数据时代高校档案社会化服务策略研究.....付煜
104 档案专题片和文献学方法.....方乐莺

《《 图书情报 TUSHUQINGBAO

- 107 机器学习和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与服务重构.....高群
110 面向“数字青年”的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转型研究.....沙成金 李文文 杨友清
113 谈图书馆开展文创产品开发.....侯宁

《《 档案春秋 DANG'ANCHUNQIU

- 116 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收发文程序的演变.....王晨
120 论日本开拓团移民前期的土地准备工作.....孟文楚
123 近代辽宁地区人力车的传入与管理.....高慧
127 民国土地立法探赜及启示.....乔少辉 王佳
131 清代京官“养廉银”问题探析.....朱泰瑞

《《 文史探源 WENSHITANYUAN

- 135 圆明园文源阁的历史及反思.....靳杰一
138 古代青铜酒器中的瑰宝——牺尊.....王晶
141 清季重商思想新论.....张翕喆
145 北魏与契丹关系述论.....李俊

《《 史料研究 SHILIAOYANJIU

- 149 清华简《金縢》篇最早成书时代考.....曾召霞
151《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献疑一则.....于宏伟
152 由清华简《系年》看《国语·郑语》关于申国的记载.....李爱民
154 东汉镇墓文所见“黄帝”与“天帝”关系考.....吴成明 侯聪玲
158《左传》“宰咺归赗”考.....丁士桓

《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献疑一则

于宏伟

摘要 《旧五代史·杨行密传》记载杨行密逝世后,其子杨渭继位后,追尊其为太祖武皇帝。《新五代史·杨行密传》则持不同看法,言杨行密是被杨溥追尊为太祖武皇帝。经过史料考证,杨渭只是为杨行密上太祖庙号,尊为孝武王,并未尊为武皇帝。杨溥继位后为其上太祖庙号,尊为武皇帝,由此可见《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确实有误。

关键词 旧五代史 杨行密 太祖武皇帝 杨渭 杨溥

中图分类号 K204.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10-22

★作者简介:于宏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

A Doubt on the Biography of Yang Xingmi in the History of Old Five Dynasties

Yu Hongwei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Yang Xingmi in the History of Old Five Dynasties records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Yang Xingmi, his son Yang Wei ascended the throne and was later honored as Emperor Taizu Wu. The Biography of Yang Xingmi in the History of New Five Dynasties holds a different view, saying that Yang Xingmi was granted the title Emperor Taizu Wu by Yang Pu.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search, Yang Wei only granted him the title of Taizu and revered him as King Xiaowu and not as Emperor Wu. After ascending the throne, Yang Pu granted him the title of Taizu and revered him as Emperor Wu.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Biography of Yang Xingmi in the History of Old Five Dynasties is indeed wrong.

Keyword the History of Old Five Dynasties; Yang Xingmi; Emperor Taizu Wu; Yang Wei; Yang Pu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天佑)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广陵。及其子渭僭号,伪追尊为太祖武皇帝^{[1]2077}。按: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的是杨溥而非杨渭,此处有误。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杨行密传》:(天佑二年)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谥曰武忠。子渥立。溥僭号,追尊行密为太祖武皇帝,陵曰兴陵^{[2]846}。卷六十一《杨隆演传》:(杨隆演)字鸿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天佑十六年)夏四月,温奉玉册、宝绶尊隆演即吴王位。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佑十六年为武义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庙号太祖,渥景王,庙号烈祖^{[2]851}。卷六十一《杨溥传》:(顺义七年)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贞,大赦境内,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2]851}。卷六十一《徐温传》:(天佑)十六年,温请隆演即皇帝位,不许,又请即吴王位,乃许,遂建国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2]856}。综上所述,《新五代史》所载杨渭只称吴王,并未称帝,为杨行密上太祖庙号,追尊为孝武王。杨溥则是由吴王称帝后,为杨行密上太

祖庙号,并追尊为武皇帝。

《资治通鉴》《九国志》《十国春秋》均持此观点。《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贞明五年三月)吴徐温帅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吴王不许。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以金继土,腊用丑。改谥武忠王曰孝武王,庙号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为太妃^{[3]8965}。卷二百七十六《后唐纪五》:(天成二年)十一月,庚戌,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3]9137}。《九国志》卷一《吴世家》:太祖,姓杨,名行密。……天佑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谥曰孝武王,庙号太祖。乾贞元年,追尊为武皇帝,陵曰兴陵。烈祖名渥,字承天,行密长子。……武义初改谥景王,庙号烈祖。乾贞元年,追尊为景皇帝,陵曰绍陵。高祖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鸿原,行密第二子。……乾贞元年,尊为高祖宣皇帝,陵曰肃陵。睿帝,名溥,行密第四子。乾贞元年称帝,天祚三年禅位^{[4]3218-3219}。《十国春秋》卷一《太祖世家》:(天佑二年)十一月庚辰,王薨,年五十四。谥曰武忠,武义初改谥曰孝武王,(下转第153页)

谓‘邑谢’之申。”^{[9]77}

南阳之申的国君《崧高》称“申伯”，上引铜器铭文中亦称“申伯”，而非“申侯”。“伯”既代表申伯之行辈，亦有“统理南方之国”的方伯之意，认为其为“侯”爵的说法未必确实^{[4]49}。所以，平王所奔的乃是西申，至于“西申”文献中何以又称“申”，徐少华先生认为：“或在申伯被支封为‘南申’之后，留在西土故地的本族，可能仍称‘申’或‘申侯’，《国语》的《晋语》、《郑语》以及《史记·周本纪》有关记载似可说明，这也正是后世部分学者将申侯之国与申伯之国混为一谈的原因所在。”^{[4]49}且前引《纪年》文中前言平王奔“西申”，后言立平王于“申”，“西申”和“申”对言，亦可知“西申”可称“申”。

关于平王出奔的这段史实，《国语·郑语》中郑桓公与史伯的问答中，史伯论曰^{[10]475}：

申、缙、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缙与西戎方将

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

此段记载，学者一般以南阳之申当之。但细绎史伯之言，文中所论之“申”当既有西申，亦有南申，只是文中未作区别，皆以“申”称之。由前面所引《系年》可知，平王奔西申之后，幽王曾起师围平王于西申。因西申、南申同源，故南申亦为平王母家的旁支，其隩爱平王则在情理之中，因此幽王若起师围西申，则南申前往救援亦在情理之中。此正可说明平王所奔乃西申，而西申非南阳之申。如果平王所奔为南阳之申，则幽王所围即其自身，又何用言“救”。而且前文申、缙、西戎并言，后文申、吕并言，亦可说明二“申”所指当有别。

现在结合清华简《系年》的内容，证实《纪年》的记载不误，《国语》中的这段记载由于西申、南申皆以“申”称之，故学者一般皆认为所指对象相同，因此迷乱了此段关于西申和南申的记载。厘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亦可藉此证明平王所奔乃西申，而非南阳之申。

参考文献

- [1]何浩.西申、东申与南申[J].史学月刊,1988(5).
-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 [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4]徐少华.“平王走(奔)西申”及相关史地考论[J].历史研究,2015(2).
- [5]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中国青铜器[J].中原文物,1984(4).
- [6]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J].文物,1978(3).
- [7]李学勤.论仲再父簋与中国[J].中原文物,1984(4).
- [8]童书业撰,童教英导读.春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9]宋公文.春秋前期楚北上中原灭国考[J].江汉论坛,1982(1).
- [1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上接第151页) 庙号太祖,乾贞元年追尊为武皇帝,陵曰兴陵^{[5]29}。卷三《睿帝本纪》:(乾贞元年)十一月庚戌,王御文明殿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庙号高祖^{[5]64-65}。

除此以外,《稽古录》《舆地纪胜》《通鉴纲目》等均认为杨溥由吴王称帝以后才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杨渭只是为杨行密上太祖庙号,尊为孝武王。由此可知,《旧五代史·杨行密传》确实有误矣。

参考文献

- [1]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4]路振.九国志[M].杭州:杭州出版社,五代史书汇编,第六册,2004.
- [5]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

ISSN 1673—9507

安顺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SHUN UNIVERSITY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JFD)》全文收录期刊
- 《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
- 《CEPS中文电子期刊》收录期刊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第22卷 第1期

VOL.22 NO.1

中国·安顺 ANSHUN CHINA

2020 1

ANSHUN XUEYUAN XUEBAO

●历史学·政治学

- 论元朝政府对阵歿群体的抚恤 于宏伟 (69)
- 清初理学儒臣张伯行经世事功探赜 高 阳 孔定芳 (74)
- 试论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的河道运输 杨育林 安尊华 (80)
- “四直为民”: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杨雪峰 (85)
- 乡村振兴中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许欢科 滕俊磊 (91)

●经济·文化

- 体育场馆 PPP 模式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 刘 伟 (96)
- 市场供给要素视域下的农村经济改革 吴咏梅 (101)
-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 基于内部控制中介效应视角 魏梦君 朱爱萍 (106)
- 风险对浮动薪酬制激励效果的影响
- 基于绝对绩效和相对绩效在代理人模型下的对比分析 李 琪 (111)
- 运河文化保护和培育的方法论探微
- 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 沈振东 (115)

●理工科教学与应用

- 关于二次曲线一般理论教学的思考 李观荣 (120)
- 表达式转换及求值探析 杨 丽 吴育辉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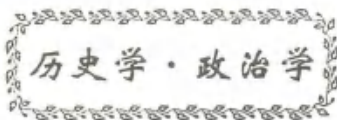
●大学生论坛

- 1961—2015 年贵州省中西部初霜、终霜及霜期的时空演变 任月倩 韩会庆等 (128)
- 基于 Hadoop 的文本分析平台实践 张吉亮 尹 兰 (132)

封二: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调查研究》成果简介

《安顺学院学报》编委会

主任委员	吴次南				
副主任委员	熊国敏				
委 员	罗荣彬	吴次南	刘 雷	陶文彩	令狐荣涛
	郭本华	伍微微	蔡少平	张 来	李世蓉
	李镇译	刘昌友	张 鹏	吴 羽	罗文帝
	黎进深	贺 雷	蒋 燕	邓文红	桂 放
	吕燕平	娄 昭	齐 娟		
学术顾问	袁本良	吕传汉			



历史学·政治学

论元朝政府对阵歿群体的抚恤

于宏伟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元朝时期战争频率较前代较高,众多军吏在早期统一战争、中期内部战争、晚期农民战争中阵歿,元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抚恤政策。阵歿的军吏可以分为身陷困境,捐躯殉职;参与作战,英勇牺牲;战斗负伤,不治身亡;行军途中,不幸卒歿四种阵歿群体。政府采取的抚恤手段主要有:追封阵歿者及上谥、官方料理丧葬事宜、赏赐钱物土地户民、荫叙亲属袭晋职位、亲侍汤药关怀伤者、旌表立祠后世传颂、政治指定结为姻亲等。除此以外,后抚恤时代的抚恤则是统治者个人情感的转移与承接,是另外一种“非抚恤”的“抚恤”。

关键词:元朝政府;阵歿;军吏;抚恤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07(2020)01-0069-05

《元史》卷九十六《赈恤志》言:“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赈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税,即《周官·大司徒》所谓薄征者也;曰赈贷者,给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谓散利者也。”^{[1]2470}为了巩固政权,元朝统治者对在任的品官和隶属于兵籍的军士实行抚恤政策,在元代史料中通常称“恤”“存恤”或“优恤”^[2]。元代赈恤形式主要分为蠲免与赈贷,赈恤群体主要包括水旱疫病受灾百姓、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以及因特殊情况而恩免的部分群体。赈恤与抚恤虽然同为“恤”的范畴,但是两者还是存在一些区别。赈恤多指朝廷因各类灾害而对百姓蠲免、赈贷,本质上为扶贫济困。而抚恤则是指朝廷对各类因公牺牲以及病故人员家属进行安慰,本质上为安抚体恤。

终元一代,不足百年,但是战争发生频率远高于其他朝代。这些战争既有对外扩张攻灭其他政权的统一战争,也有巩固政权消灭叛乱敌对势力的战争,还有后期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战争。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立元朝。元朝政权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征服扩张与稳固政权,陆续进行了元日战争、元越战争、元缅战

争、元爪战争以及消灭国内叛乱敌对势力的战争。末期随着统治集团的腐败,爆发了农民起义,韩山童、刘福通、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揭竿而起。元朝政府针对阵歿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抚恤政策,既是对于死者牺牲殉职行为的肯定,更是对于生者物质精神上的慰藉,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导向。因此,有必要对军事战争中阵歿的群体予以界定分类,并就其阵歿后政府所采取的抚恤政策进行研究概括。

一、阵歿群体的界定分类

阵歿,含义为战争中阵亡,亦指代阵亡者。《魏书》卷九《肃宗本纪》有言:“幽州刺史毕祖晖、行台羊深并奔退,祖晖于阵歿”^{[3]292}。又见《魏书》卷三十七《司马天助传》:“真君三年,与司马文思等南讨。还,又从驾北征。在阵歿。”^{[3]395}这是传世史书中所见有关阵歿的最早记载。阵歿指军事战争阵亡者,但是其中又分为许多复杂情况,因此有必要对阵歿群体予以界定分类。

1. 身陷困境,捐躯殉职的军吏

此类阵歿军吏是指部分军吏在出使他国、治理地方、军事战争中身陷困境,为敌所俘,最终捐躯

收稿日期:2019-12-05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公”研究生科研创新提升计划“《元史》蒙古族将臣传记考订拾遗”(项目编号:18LSZGB007)。

作者简介:于宏伟(1994~),男,河北张家口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

殉职。属于此类阵歿群体的军吏主要包括以下数人：帖木儿不花、阔里吉思、月里麻思、廉希贤、阿塔赤、拜住、普化帖木儿、达识帖睦迩、察罕帖木儿、庆童、泰不华、星吉、福寿、达尼达思、贺方、道童、月鲁不花、刘德仁、史天倪、唐庆、赵炳、陈祐、杨不花、赵伯忽、孛术鲁远、王积翁、汪泽民、王英、陈祖仁、王逊、石抹宜孙。

另有《元史·忠义传》中所载八剌、不兰奚、合剌普华、刘天孚、萧景茂、张桓、李黼、李齐、褚不华、伴哥、喜同、韩因、卞琛、乔彝、张岩起、王佐、吴德新、颜瑜、曹彦可、王士元、杨朴、赵琬、石普、盛昭、杨乘、纳速刺丁、伯颜不花的斤、樊执敬、全普庵撒里、周铿、谢一鲁、聂炳、刘耕孙、刘焘孙、刘硕、俞述祖、桂完泽、丑阔、冯三、孛罗帖木儿、彭庭坚、王伯颜、刘潜、朵里不花、野峻台、卜理牙敦、潮海、民安图、黄绍、斗元、黄云、魏中立、于大本、普颜不花、婁阿鲁真、申荣、闵本、赵弘毅、赵恭、赵官奴、郑玉、黄昇、柏帖穆尔、迭里弥实、获独步丁、朴赛因不花、张庸、丁好礼等人。《元史·忠义传》所载人物在面临困境时，保持应有气节，最终不屈而死。因此此类群体在得到元朝政府己方抚恤的同时，也受到了敌方一定的尊重与推崇。

上述官吏将士多为政府的公职人员，在代表朝廷履职时为己方异议者、农民起义军、乡间匪盗、以及其他敌对势力所困，或是坚持己见自杀殉职，或是不屈不降最后被杀。此类阵歿群体和现代意义上的“因公殉职”有较大相似。元朝政府对于此类人员采取一定的抚恤政策，既是对这种不屈而死行为的极大肯定，又有利于弘扬宁死不屈、舍身为国的社会风气。

2. 参与作战，英勇牺牲的军吏

元朝时期对外对内战争次数剧增，众多将士在战争中作战积极、英勇牺牲，表现出了军人应有的执行力与战斗力。属于此类阵歿群体的军吏主要包括以下数人：火赤哈儿的斤、阿剌瓦而思、别帖怯里、忽都哈思、哈八儿赤、玉笏迷失、唆都、也速歹儿、匿答儿密立、爱忽赤、仁通、杭忽思、完泽、海都、塔儿忽台、阿塔赤、石抹度剌、张晋亨兄（姓名不详）、张好右、杨杰只哥、刘浩、郑鼎、张弘纲、赵匣剌、郑义、郑德温、张进、张玉、樊楫、张山、高守忠、石抹老瓦、董转霄、董昂霄、李伯通、李守正、王七十、任存、伯八。这类群体多以将军士兵为主，政府官吏较少。上述官吏将士在元朝政府早期对外统一征战、中期巩固政

权、晚期镇压各地起义过程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最终战死疆场。

3. 战斗负伤，不治身亡的军吏

部分将士军吏在行军作战过程中身体负伤，由于受伤过重加之行军医疗水平有限，最终不治身亡。属于此类阵歿群体的军吏主要包括以下数人：来阿八赤，作战中身中毒矢，头部及其他部位受伤严重，不治而亡^[1]。高阔儿，至元二十二年，海战中身中毒矢，不治而亡^{[5]3135}。董士元，征讨宋朝，负伤后来阵亡^{[6]6250-6251}。上述军吏虽然不是直接作战阵歿，但是却是因军事战争负伤严重，加之医疗水平所限与治疗延误，最终不治身亡。因此，此类群体同样属于元朝政府抚恤范围之内，亦是本文研究对象之一。

4. 行军途中，不幸卒歿的军吏

行军途中，由于行军征战条件艰苦恶劣，部分军吏不幸卒歿。属于此类阵歿群体的军吏主要包括以下数人：霸突鲁、宋都、木花里、脱落合察儿、明安答儿、黄头、忽都虎、哈兰术、阿剌罕、马塔儿沙、帖赤、帖木脱斡、哈兰术、拜答儿、李罕、明安、囊加台、耶律买住、耶律忽林带、忙古带、刘世英、抄儿赤、管如德、王昔剌、王国昌。以上军吏在行军过程中不幸卒歿，史书中并未提及具体卒歿原因，只是记载其卒歿于军。因此将其归入“行军途中，不幸卒歿的军吏”一类。

二、元朝政府的抚恤政策

1. 追封阵歿者及上谥

追封与上谥为古代朝廷赏赐功臣的重要手段，亦是元朝政府对于阵歿者进行抚恤的重要政策。所谓追封，同追谥、追尊，为已故者追加封号。上谥是为朝廷对于逝者生平的评价，主要依据为逝者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是对于臣子一生的高度概括。阔里吉思，战争中为敌所执，不屈而死。追封为高唐忠献王，加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驸马都尉，追封赵王^{[1]2926}。月鲁不花，被倭寇所害，朝廷赠推忠宣武正宪徇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谥忠肃^[7]。孙，为张士诚部下所杀，赠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曹南郡公，谥忠烈。赐田三顷恤其家^{[1]4401}。王伯颜，为叛军所杀，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太原郡侯^[9]。元朝政府对于阵歿军吏追封与上谥，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是对逝者牺牲的安抚慰问。因此这种追封与上谥具有双重性，既是朝廷沿用追封上谥的惯例，更是军事战争条件下

的特定抚恤手段。

2. 官方料理丧葬事宜

官方料理丧葬事宜,是元朝政府抚恤政策的重要内容,部分军吏生前较为清贫,其家难以支付丧葬费用,政府出面料理丧葬事宜本身体现了对于逝者的人文关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派遣亲贵要员负责治丧、拨发丧葬费用所需钱币、为逝者定制灵牌、购买葬具、配备送葬队伍等。如,阔里吉思,战争中为敌所执,不屈而死。洪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鲁差兵五百人,护其行至殡所,奠告启视,尸体如生,遂得归葬^{[1]2926}。阿答赤,征战江南时阵亡,朝廷特赐钞七十锭、白金五百两作为丧葬费用^{[1]3280}。萧景茂,为县民李智甫作乱所杀,朝廷拨款予以厚葬^[9]。曹彦可,为敌人所杀害,中书省拨款料理丧事^{[1]4401}。贾鲁,在军中病卒,太师月赤察儿亲自治丧,选配士兵护送其灵柩,并赏赐交钞五百锭^{[1]4292}。元朝政府亲自出面料理丧葬事宜,将阵歿群体的丧葬事宜上升为国家主导事务,对于阵歿群体而言是莫大哀荣。

3. 赏赐钱物土地户民

赏赐钱物土地户民亦是元朝政府抚恤的重要手段,通过发放抚恤金的形式厚待逝者家人,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及对逝者阵歿的肯定。如,月里麻思,征战南方,被宋军俘虏、关押三十六年不屈而死。世祖皇帝下诏为其平反,并赏赐大量粮食给其家人^{[1]3036}。阿塔赤,与宋军作战,宋降将洪福趁其醉酒将其杀害。元世祖赐其家白金五百两、钞三千五百贯,并赏赐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5]3224-3225}。孙,为张士诚部下所杀,赐田三顷恤其家^{[1]4404}。土地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元朝政府直接赏赐钱物土地户民,阵歿群体自身无法享受,其家人则是赏赐抚恤的直接受益者。

4. 荫叙亲属袭晋职位

军吏阵歿后,元朝政府还会采取荫叙亲属袭晋职位的方式进行抚恤。如,阔里吉思,战争中为敌所执,不屈而死。除了其本人被追尊上谥外,其妻子公主忽答的迷失追封齐国长公主,女儿爱牙失里封齐国公主,并加封赵国公主。其儿子术安年幼,以阔里吉思弟弟术忽难袭封高唐王^[2926]。哈兰术,征战密州时阵亡,命其子忽刺袭承职位,并授昭勇大将军^{[1]3035}。察罕帖木儿,与王士诚等谈判被杀害。封其父阿鲁温汝阳王,后又进封梁王^{[5]4263}。一般来说,荫叙亲属多为逝者的儿子,但是也有极少数是妻子、父亲、侄儿等。所谓袭晋即为承袭与晋封,一是对于原来未担任官职的群体让其承袭逝

者生前职位,另一则是逝者亲属原本自身担任职位,在此基础上对其予以晋升,而逝者原本职位另选他人担任。

5. 亲侍汤药关怀伤者

皇帝亲自出面或指派高级官员为伤者侍奉汤药,对伤者病情予以关心料理,相较于普通赏赐、袭晋等方式更具有政治性、象征性。一般赏赐、袭晋并不直接由皇帝负责,而是兵部、户部、吏部或者军队内部自行处理。但是皇帝亲侍汤药则不同,皇帝亲自出面则直接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与关怀。这其中既有皇帝出于个人情感的原因,更多的则是统治者的驭人之术,通过这种形式来笼络人心,加强个人权威,塑造自身仁君形象。如:畏答儿在作战中脑中流失,受伤严重,皇帝亲自前往营帐侍奉汤药,让其在帐中静养。后来畏答儿病逝,皇帝深表惋惜^{[5]2788-2789}。汪德臣在战争中被飞石击中负伤,皇帝派人慰问病情,又派遣丞相亲赐汤药以示关怀^{[1]3653}。

6. 旌表立祠后世传颂

旌表立祠则是以历史书写的方式对阵歿者的抚恤关怀,古人非常注重自身的身后评价,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渴望“名垂青史”的心理。旌表立祠是将逝者的生平事迹予以铭刻,以此来供后世瞻仰。如,察罕帖木儿在与王士诚等谈判时被杀。朝廷命令家乡所在地区建立祠堂,每逢时节祭祀,以示纪念^{[1]3380}。李黼与敌人力战而死,朝廷为表其忠勇,下诏在江州建立庙宇纪念,并且赐匾额名曰崇烈^{[1]4394}。丑闻在曾法兴进攻安陆时被抓,坚决不降而死,其妻子侯氏亦自尽不降,朝廷立表其门曰双节^{[1]4417}。刘潜被人割舌而死,朝廷为刘潜在福州北门外修建祠堂,定期祭祀以示抚恤^{[6]6261}。泰不华被方国珍杀死投尸海中,朝廷在台州建立庙宇以示纪念,并赐崇节匾额^[10]。

7. 政治指定结为姻亲

和亲侍汤药关怀伤者一样,政治指定结为姻亲的方式同样具有政治性、象征性,此类婚姻本质上为政治联姻。其中的因素主要为两种,一种是统治者为了感激阵歿群体对于朝廷、国家的牺牲付出,而将自己的女儿亲眷选配给阵歿者家属;一种是阵歿者虽已逝世,但是其家族与集团势力尚在,统治者出于政治笼络的目的而进行政治联姻。这类抚恤手段较为少见,仅见火赤哈儿的斤一人。火赤哈儿的斤,行军还至火州,遭遇敌人,最终因寡不敌众阵亡。除了赏赐金币数万以外,皇帝还指定公主婚配其子^{[5]2648}。

三、后抚恤时代的抚恤

所谓后抚恤时代是指军吏阵歿之后,限于各种原因当时元朝政府并未立即对逝者本人进行追封上谥、料理丧葬、旌表立祠等方式进行抚恤,也并未对家属亲眷赏赐财物、袭晋职位、结为姻亲等方式进行抚恤,而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对逝者的后代进行提拔重用,本质上是一种抚恤情感的转移和承接。但是这种抚恤方式和亲属承袭职位有较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时间,后抚恤时代的抚恤关怀是在逝者逝世多年以后,统治者在面对逝者的后代时,将多年前的感谢、愧疚之情转化为对逝者后代的重用提拔。亲属承袭职位的抚恤则是在逝者去世以后,立即采取的抚恤照顾政策,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差别。因此,相较于亲属承袭职位,后抚恤时代的选拔重用更掺杂了统治者的个人情感于其中。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博尔忽传》:“博尔忽,许兀慎氏,事太祖为第一千户,歿于敌。……子月赤察儿,性仁厚勤俭,事母以孝闻。资貌英伟,望之如神。世祖雅闻其贤,且闵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见。帝见其容止端重,奏对详明,喜而谓曰:‘失烈门有子矣。’即命领四怯薛太官”^{[1]2949}。事实上,月赤察儿在初期受到元世祖选拔重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对于博尔忽个人情感的转移,元世祖在接见月赤察儿时所流露出的悲悯之情即是最好的证明。在统治者的个人情感与月赤察儿个人能力双重作用下,月赤察儿不断得到重用,最后官拜太师。《元史》卷一百二十五《铁哥传》:“(铁哥父亲)韩脱赤亦贵用事,领迦叶弥儿万户,奏曰:‘迦叶弥儿西睡小国,尚未臣服,请往谕之。’诏偕近侍以往。其国主不从,怒而杀之,帝为发兵诛国主,元贞元年封代国公,谥忠遂。韩脱赤之歿,铁哥甫四岁,性颖悟,不为嬉戏。从那摩入见,帝问谁氏子,对曰:‘兄韩脱赤子也。’帝方食鸡,辄以赐铁哥。铁哥捧而不食,帝问之,对曰:‘将以遗母。’帝奇之,加赐一鸡。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见书畏吾字于壁,问谁所书,僧对曰:‘国师兄子铁哥书也。’帝召见,爱其容仪秀丽,语音清亮,命隶丞相孛罗备宿卫。先是,世祖事宪宗甚亲爱,后以谗稍疏,国师导世祖宜加敬慎,遂友爱如初。至是,帝将用铁哥,曰:‘吾以酬国师也。’于是铁哥年十七,诏择贵家女妻之,辞曰:‘臣母汉人,每欲求汉人女为妇,臣不敢伤母心。’乃为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饔膳汤药,日益亲密。”^{[1]3075}铁哥父亲韩脱赤曾经被朝廷派遣出使迦叶弥儿国被杀害,因此皇帝感到惋惜与愧疚,当时并未对韩脱

赤采取抚恤政策,而是将这种情感转移到其子铁哥身上。宪宗、世祖在得知铁哥是之前殉难的韩脱赤之子时,将自己所食之物赏赐给铁哥以及后来为铁哥赐婚都充分体现了皇帝的个人情感。

因此除了常见的抚恤政策以外,应当还有后抚恤时代的抚恤,这类抚恤更具有统治者的人文关怀。虽然在逝者殉难之时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在后续实施的却更具效果性。殉难者的亲属后代往往因为得到统治者的怜悯与感激,加之个人才华展现,最终能够获得皇帝的重用。月赤察儿、铁哥皆是如此,皆因自己父亲不幸遇难,而当时朝廷并未立即进行抚恤关怀,月赤察儿、铁哥最终成为后抚恤时代抚恤的最大受益者。

四、未见抚恤关怀的阵歿群体

在论述元朝政府对阵歿群体的抚恤关怀之后,检索《元史》传记部分,发现存在这样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份为官吏、军士,其阵歿原因不尽相同,或为敌人所困不屈而死,或身先士卒阵亡疆场,或行军途中不幸身亡,但是其传记中并未见元朝政府是采取何种政策对于其抚恤关怀。我们可以推测,元朝政府当时应该是采取了一定措施对阵歿者关怀抚恤,由于种种原因史书中漏记。因为这类阵歿群体均是为国事死之,而其身份地位并不比前文中所提的四种阵歿群体地位低微,若元朝政府故意忽视其群体存在而不进行正常的抚恤关怀,于情于理不符。这些阵歿群体毕竟是为国事死之,其牺牲对于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均有一定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此将其予以呈现。

检索《元史》,未发现抚恤记录的阵歿者主要有:别里虎、宋都、兀鲁台、脱落合察儿、密里吉、忽都虎、阿剌瓦而思、抄儿、别帖、忽都哈思、阿儿思兰、哈八儿秃、玉笏迷失、廉希贤、米阿八赤、阿剌罕、也速歹儿、马塔儿、帖赤、匣答儿密立、八思忽都探花爱忽赤、仁通、完泽、海都、塔儿忽台、李罕、明安、囊加台、朵儿只、达识帖睦尔、普化帖木儿、庆童、星吉、达尼达思、史贺方、刘浩、石抹老瓦、王逊、王昔刺、高觥、李齐、韩因、卜琛、王士元、杨樸、石普、周铿、刘耕孙、朵里不花、卜理牙敦、魏中立、张庸、丁好礼、郭庸。

结 语

关于元朝时期抚恤政策研究较少,特别是战争阵歿群体的抚恤关怀研究更为少见,有关文章仅见《元代官方的救荒和抚恤政策》一文。今结合传世史料,对于元朝阵歿群体予以界定分类,身陷困

境、捐躯殉职,参与作战、英勇牺牲,战斗负伤、不治身亡,行军途中、不幸卒歿四种阵歿群体背后反映的则是元朝时期复杂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元朝政府采取的追封阵歿者及上谥、料理丧葬事宜、赏赐钱物土地户民、荫叙亲属袭晋职位、亲侍汤药关怀伤者、旌表立祠后世传颂、政治指定结为姻亲等抚恤政策。体现了元朝统治者主动适应中原文化而采取的行动,对于塑造自身亲民亲善形象,营造爱国敬业奉献的社会风气,培养军民百姓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后抚恤时代的抚恤背后则是统治者个人情感的转移与承接,这种抚恤政策更具代表性与实效性。史书中对于部分阵歿群体的关怀抚恤缺少记载,但是他们为国捐躯的行为与坚守不屈的品质同样值得提倡宣扬。

参考文献:

[1](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李莎.元代官方的教荒和抚恤政策[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8):54.

[3](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8.

[4](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98:来阿八赤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631.

[5](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6](清)嵇璜.续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7](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卷38:月鲁不花传[M].北京:扫叶山房藏板,第17册:10.

[8](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39:秩官[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838.

[9](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5:萧景茂传[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158-159.

[10](明)黄光升.昭代典则卷1:太祖高皇帝[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4.

A Study on the Groups Di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Pension Policy

YU Hongw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cy of wars in Yuan Dynast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revious dynasties. Many military officials died in the early unification war, the middle internal war and the late peasant war. The Yuan Dynasty government adopted a series of pension policies. The army officials who died in the battle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who were in trouble and died in the line of duty. Participate in the battle and sacrifice bravely; He was wounded in the battle and died. During the march, four groups died, including unfortunate soldiers. The government's pension means mainly include: chasing the dead and the deceased, taking care of funeral affairs, giving money and property to the people of the land, sheltering relatives from the Jin dynasty, caring for the wounded with soup and medicine, honoring the memory of future generations, and appointing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become in-laws. In addition, the pension in the post-pension era is the transfer and acceptance of the ruler's personal feelings, which is another kind of "pension" that is not "pension".

Key words: Yuan government, array death, military officials, comfort and compensate a bereaved family

(责任编辑:郑朝彬)

ISSN 1008-9128

CN 53-1196/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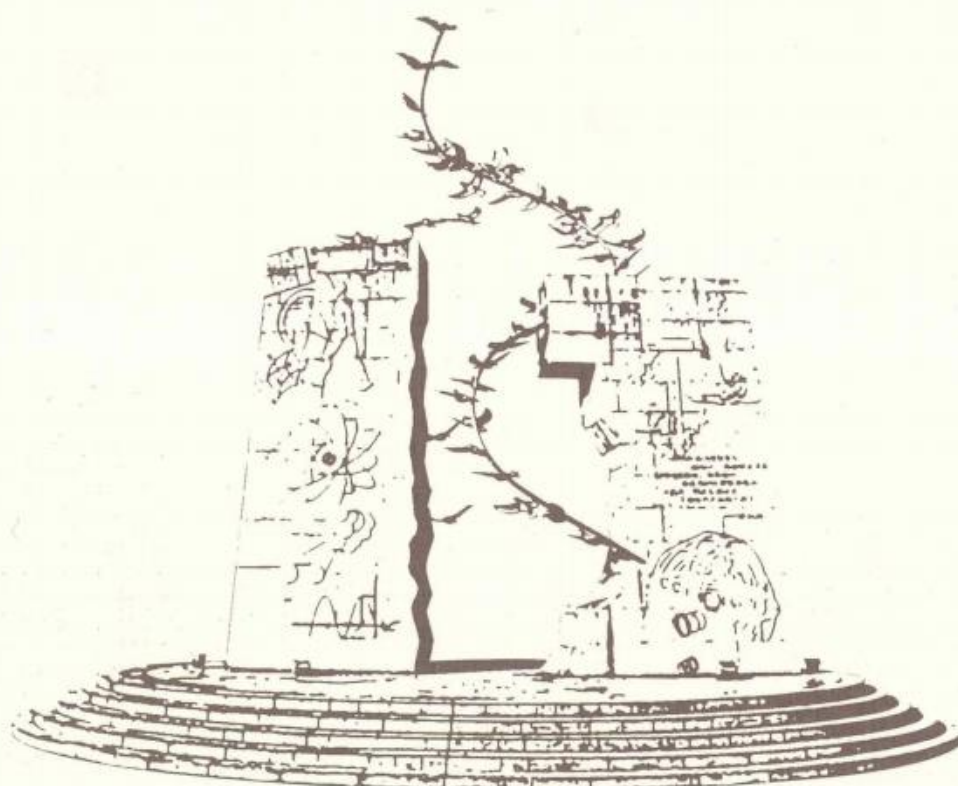


红河学院

学报

2020 03

第18卷 第3期 总第175期
Vol.18 No.3 Sum No.175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录

81/贺玮程 庞守贵

“编码—解码”理论视域下军事真人秀节目的创作特色研究——以湖南卫视《真正男子汉》为例

85/王 洋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略谈
——以红河学院广播电视台为例

【历史学研究】

88/马岑晔

唐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和防御体系的建构、演化与终结

94/张建平

《明史·儒林传》不载李贽传研究

99/于宏伟

《新元史》勘误两则

【教育学研究】

101/王 力

民族地方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若干思考——以红河学院为例

104/盛永红

曹能秀

“双一流”建设中边疆地方高校发展路径选择——以云南省为例

108/李 珍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优化融合模式探析

111/韩存新

黄 琪

小学英语一年级课内外教材词汇对比研究

115/李焘焘

王保云

王 婷

创客教育核心要素生态链模型及其运作机制

120/宁晓琳

数学文化教育在培养高职学生数学素养的应用研究

【经济学研究】

123/曾秋梅

张义

王丽娟

云南跨境农产品物流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127/傅娟娟

基于县域经济差异分析漳州市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政治学与哲学研究】

131/张南侠

美对菲安保承诺的三重含义探析

135/单啸洋

论网络空间中虚拟性认识的运行机制

【文学与艺术学研究】

139/徐健翔

活着的意义——艾米莉·狄金森死亡诗的解读

142/刘砚秋

西游戏曲之《钓鱼船》与《进瓜记》比较研究

145/张 洁

《出三藏记集》札记六则

147/曹 健

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淡”

【法学与体育学研究】

151/孙 涛

我国民事合伙的重新审视及完善

156/戴治东

程明吉

我国健美操研究热点圈化及其发展脉络研究
——基于CNKI数据的可视化

封二:公益广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居家防护

封三:公益广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办公共场所防护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主管

云南省教育厅

主办

红河学院

编辑 出版 发行

红河学院学报编辑部

出版日期 发行范围

双月8日

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

云南金伦云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出版物号

ISSN 1008-9128(国际标准出版物号)

CN 53-1196/C(国内统一出版物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532500400008 号

投稿网址:

<http://hhxb.cbpt.cnki.net/>

E-mail:

hhxb123@163.com

《新元史》勘误两则

于宏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新元史》在纠正《元史》错误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错误, 张京华、黄曙辉总校的《新元史》于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次修订再版系统地纠正了之前版本存在的疑误, 全面吸收了学界的学术成果, 为《新元史》之最新版本。查阅此次2018年版《新元史》发现其中存在两处疑误, 予以指出考订勘误。

关键词: 硕德; 韩拙; 月赤察儿; 大德元年; 太师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 (2020) 03-0099-02

一 《硕德传》

《新元史》卷一百二十列传十七《硕德传》载: 硕德奏, 辽东韩拙、吉烈灭二部数人寇, 宜遣近臣谕之。帝难其人, 执政请即使硕德往。^{[1]2725}按: 辽东韩拙部误, 当为辽东斡拙部, 此处系字形相近而误录。查阅诸史, 此处错误系《新元史》各版本共同错误, 并非仅存于2018年版。

元代黄潘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朝列大夫金通政院事赠荣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鲁国公札尔公神道碑》载: (硕德) 所奏数事, 无不听纳。因言辽阳女真之东斡拙、吉烈灭二族之人数人寇, 内地宜遣亲臣, 设驿以通之。^{[2]1009-1010}《元史》卷一百一十九《硕德传》载: 尝言辽东斡拙、吉烈灭二种民数为寇, 宜遣近臣谕之。帝方难其人, 金曰: “惟硕德元勋世胄, 可使。”^{[3]2941}《元史类编》卷十六《朵尔直班传》载: 硕德为乃燕之子, 尝平辽东斡拙、吉烈灭二种, 及使西域屡着奇功, 早卒。^{[4]10}《蒙兀儿史记》卷二十七《硕德传》载: 会初设通政院, 汗即拜硕德嘉议大夫、同知院事。奏言辽东斡拙、吉烈灭二部人数寇边。^{[5]269}《元史新编》卷二十一《硕德传》载: 察硕德通敏有干才, 世祖即位, 入宿卫, 典朝仪, 后同知通政院事。帝忧辽东斡拙、吉烈蔑二种人数为寇。^{[6]230}《元书》卷三十二《硕德传》载: 硕德亦曰拾德, 世祖时入宿卫, 典朝仪, 后同知通政院事, 使至辽东, 讨定斡拙、吉烈灭寇乱。^{[7]1144}《(民国) 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一《人物志》载: 硕德, 中统初入宿卫, 通敏有干才, 世祖尝命安童举其族人之贤者, 安童以硕德对, 因命同知通政院事。辽东斡拙、吉烈灭二部数人寇, 硕德请遣谕之。乃檄诸万户屯兵据险, 而使人谕斡拙吉烈灭二部, 二部慑兵威, 缚首要请降, 自是不敢犯边。^{[8]2262}白寿彝编的《中国通史》对于斡拙部作出

详解: 兀者, 分布于辽阳行省北部的通古斯语族居民, 还有被统称为吾者、兀者或斡拙的诸部。^{[9]264}由此可见, 《新元史·硕德传》所载“韩拙”确实有误, 当改为“斡拙”。

二 《月赤察儿传》

《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十八《月赤察儿传》载: 成宗即位, 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 兼知枢密、宣徽院事。大德元年, 拜太师。^{[1]2750}按: 月赤察儿大德元年, 拜太师。此处时间有误, 官拜太师当为大德四年^①。此处错误亦系《新元史》各版本共同错误, 并非2018年版独有。

《新元史》卷十四《成宗本纪》载: (大德四年六月) 丙辰, 太傅月赤察儿为太师, 中书右丞相完泽为太傅。^{[1]191}《新元史》卷三十《三公表》亦云庚子大德四年, 月赤察儿为太师。^{[1]639}《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月赤察儿传》载: 成宗即位, 制曰: “月赤察儿尽其诚力, 深其谋议, 抒忠于国, 流惠于人, 可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枢密、宣徽使。”大德四年, 拜太师。^{[3]2950}《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载: (大德四年六月) 丙辰, 以太傅月赤察儿为太师, 完泽为太傅, 皆赐之印。^{[3]431}《元史》卷一百一十《三公表》言庚子大德四年, 月赤察儿为太师。^{[3]2778}元代元明善撰《清河集》卷二《太师淇阳忠武王碑》载: 明年, 成宗皇帝登极, 制曰: 月赤察儿尽其诚力, 深其谟谋, 抒忠于国, 流惠于人, 可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 枢密宣徽两使如故。大德四年, 拜太师。^{[10]966}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二十三《太师淇阳忠武王碑》载: 明年成宗皇帝登极, 制曰: 月赤察儿尽其诚力, 深其谟谋, 抒忠于国, 流惠于人, 可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 枢密宣徽两使如故。大德四年, 拜太师。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至公”研究生科研创新提升计划(18LSZGB007)

作者简介: 于宏伟(1994—), 男, 河北张家口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政策及民族史。

[11]276《宋元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元纪四》载：（大德四年）六月丙辰，以太傅月赤察儿为太师，完泽为太傅。^{[12]15}《元史类编》卷四《天王二》载：（大德四年）六月丙辰，加月赤察儿太师、完泽太傅。^{[4]13}《蒙兀儿史记》卷九《铁穆耳可汗本纪》载：（大德四年）六月，诏立窟麻剌哥撒八为缅国王，赐银印。太傅月赤察儿进拜太师，加完泽太傅。^{[5]125}《元书》卷六《成宗本纪》载：（大德四年）六月己酉，立缅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为缅国王。丙辰，太保月赤察儿为太师，右丞相完泽加太傅，并录军国重事。^{[7]184}综上，无论是两元史三公表及本纪所言，还是元人所录碑刻及明清史料均载月赤察儿大德四年官拜太师，而非大德元年。《新元史·月赤察儿传》确实有误矣，月赤察儿官拜太师时间当改为大德四年。

注释：

①大德四年，系元朝大德年号，为公元1300年。以下同，不另作说明。

参考文献：

- [1] 柯劭忞.新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2]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库丛刊初编:第349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 [3]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藏板[Z].乾隆六十年(1975年).
- [5] 屠寄.蒙兀儿史记:元史二种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6] 魏源.元史新编[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 [7] 曾廉.元明史料丛编:第三辑:第3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2010.
- [8] 张伯英.(民国)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9]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10] 元明善.清河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08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5.
- [11] 苏天爵.元文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2] 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Z].明吴中珩刻本.

[责任编辑 刘贵阳]

Two Errors in *History of the New Yuan Dynasty*

YU Hong-wei

(Nor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uan Dynasty* has made new mistakes while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uan Dynasty*, which was published by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2018 by Mr. Zhang Jing-hua and Mr. Huang Shu-hui, has systematically corrected the previous doubts and errors, and has fully absorbe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is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uan Dynasty*. But when reviewing the 2018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uan Dynasty*, we found two doubtful mistakes and pointed out the textual criticism and correction.

Key words: Shuo De; Han Zhuo; Yue Chichaer; Da De first year; Grand Tutor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入网期刊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学报

2020.2

第 31 卷 第 2 期

Vol.31 NO.2

录

国家符号语境下的民族团结——以人民币发行演变为中心

..... 于宏伟,王首敬(61)

中华文化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广西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 黄玉娇(67)

骆越文化研究专栏

骆越服饰文化——骆越文化研究之十六 章彩奎(73)

汉武帝平定岭南后的骆越社会——骆越文化研究之十七

..... 郑海宁,郑超雄(80)

海南岛铜鼓来源试探——骆越文化研究之十八

..... 蒋廷瑜,彭书琳(86)

观察与思考

南岭山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策措施研究 周海燕(92)

关于金融合作内涵、动因、挑战和测度的研究综述

..... 申 韬,蒙飘飘(96)

法律与经济问题研究

量与质的充分供给:新时代法治发展对策研究

..... 刘 旭(102)

干部培训研究

在行动学习项目实施过程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以贺州实践

为例 陈殿余(107)

积极推进网络统战工作——广西网络统战工作座谈会综述

..... 韦晓玲(111)

本期执行编辑:祝远娟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1 No.2

Published on Apr. 18th 2020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LIANG Jing-cheng

Deputy Editor-in Chief: AI Xin-qiang

Editorial Director: WU Hong-bo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Feng Huang Printing House of
Party Committe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Price: ¥10.00



英文翻译:杨绪强

国家符号语境下的民族团结

——以人民币发行演变为中心

于宏伟,王首敬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是国家符号,是国家象征。人民币自发行以来,经历了五套体系演变,民族团结主题贯穿始终。人民币在发行之初,充分兼顾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币面文字的选取,传播了民族语言文化。币面图案的设计,展现了民族风情地貌。人民币发行演变展现了国家符号语境下的民族关系互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关键词:国家符号;人民币;文字;图案;民族团结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2.01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2-0061-06

人民币^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符号,既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对于当代国情、民情的重要反映。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这是第一套真正意义上属于人民的货币。此后又于1955年3月1日发行第二套人民币,1962年4月15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1987年4月27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999年10月1日发行第五套人民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2015年分别发行2005年版、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2019年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

2019年版人民币在纸币规格、主图案、主色调、行名、国徽、盲文面额、汉语拼音行名、民族文字等方面保持不变,提高了票面色彩鲜亮度,优化了票面结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对于毛泽东头像、装饰团花、横号码、背面主景和正背面面额数字的样式进行了调整,增加正面左侧装饰纹样,取消正面右侧凹印手感线和背面右下角局部图案,票面年号改为“2019年”。此次发行2019年版人民币是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主动调整,对于提高货币防伪技术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是经济领域流通的媒介,然而其早已超过经济范畴中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国家人文形象的

收稿日期:2020-01-20

作者简介:于宏伟,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王首敬,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媒体人类学。

①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两种形式,本文研究对象特指纸币。

表征符号,浓缩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构建民族团结大景观,作为国家符号的人民币被赋予民族团结的内涵,将民族团结这一概念具象化。2018年是人民币发行70周年,人民币作为共和国法定货币,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走过了光辉的历程。人民币的发行演变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构建的主动调适,纵观其演变历程,这种调适主要体现在币面面额、语言文字和图案背景选取上,始终不变的是将民族团结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和对于民族关系的高度重视与巩固。

一、发行过程兼顾民族地区实际

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社会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济独立性与文化特异性。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发行的货币在边疆民族地区流通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发行货币必须兼顾其地区实际情况。国民政府时期发行的法币与金圆券,就货币名称而言,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的主导性、发行的法定性,从发行过程而言缺乏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兼顾,最终过度发行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自发行之日起便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兼顾民族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初,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货币兑换发行实际情况,采取了有序兑换旧币、分期发行新币、印制民族文字等措施,确保人民币在民族地区发行顺利,使其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随后发行50元、20元、10元三种面值人民币,这是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1951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关内关外币制的命令》,决定加强货币统一,收回东北银行与内蒙古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同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具体办法收兑东北及内蒙古地方流通券》,对于收取兑换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指出:“自四月一日起开始收兑,六月一日起停止使用。因为内蒙古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内蒙古人民银行地方流通券的兑换期限将延至七月底。

人民银行为照顾内蒙古人民,特印制了一部分有蒙古文字的人民币在内蒙古地区流通。”^[1]鉴于内蒙古等民族地区旧币回收与新币发行存在时间差,中国人民银行将兑换时间适当延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人民至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施政原则。

1951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自1951年10月1日起在新疆发行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并准在全国流通,指出,为了统一币制,并照顾新疆各民族的习惯起见,决定在新疆省发行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兑回新疆省银行所发行的银元票……此带维吾尔文之人民币准在全国流通,同时不带维吾尔文之人民币亦可在新疆省内流通^[2]。党和国家在推广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时,充分考虑到了新疆地区的特殊情况,充分尊重了当地民众的语言风俗习惯,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首次所发行的10000元、5000元、1000元、500元四种面额的人民币均增加了维吾尔文。在流通方面,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方便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在内地开展经贸活动,促进了文化融合、经济互动、民族交流。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塔塔尔族的著名画家、书法家外里艾合麦特·毛拉西夫题写维吾尔文“中国人民银行”,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兼顾,增进了各民族之间认知情谊,展现了民族团结这一主题。

人民币作为一种国家符号,它具有指称意义、符号意义、文化意义和泛化意义。作为符号的人民币,其能指是所代表的币值,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工具;其所指是人民币作为国家象征,所蕴含的国家、社会层面的意义,体现着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变迁。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创新载体和方式,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3]。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人民币发行兼顾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既是较好的例证,也是开展民族工作的创新载体和方式。人民币从诞生之时便肩负着宣传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重任,在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文字选取传播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为一体的特殊符号系统,文字则是记载这种符号系统的另一种符号系统。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语言文字,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即是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反映。自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开始,人民币在语言文字选用上便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既体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更能使少数民族在民族与国家的互动中,不断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从而促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构。

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57种图案、62种版别,版面与版别设计主题思想不统一,或为名胜古迹,或为农业生产,或为工业机器,或为交通运输,或为工农人物。版面与版别过于复杂多样化,在展现历史文化与建设风貌的同时,也给流通识别造成了困扰,为此发行新版人民币显得尤为必要。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以下简称“新币”),以收回现行人民币(以下简称“旧币”)。新币面额,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五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六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43]。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新人民币颜色图景的通告》,对于发行新版人民币的版面设计图案作了详细规定:为便利市场交易、整点和识别起见,新币各种券别各有不同颜色、图景和规格,背面并书有汉文、蒙文、维吾尔文、藏文等四种文字及我国国徽^[4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藏文首次出现在人民币中,之所以藏文没有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中,原因主要是1951年5月23日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西藏的稳定与改革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当时并未在第一套人民币中印制藏文。第二套人民币共有11种面额16种版别,具体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天安门甲版、天安门

乙版)、2元、3元、5元(民族大团结甲版、民族大团结乙版)、10元。币面全部印有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3种少数民族文字,上方为汉文,下方为蒙古文,左方为维吾尔文,右方为藏文。四种文字对称分布、布局合理,彰显了各民族平等团结、欣欣向荣的主题。

1962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并且陆续收回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在原先印有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壮文(旧),从此人民币中印制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五种民族文字成为定制。在文字布局方面进行了调整,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横向排列,第一行为蒙古文,第二行、第三行为藏文,第四、五行为维吾尔文,第六行为壮文(旧)。这四种文字六行排序,镶嵌在由两个方形重叠组合的八角图形内,通过凹印立体效果并由团花上下部分有机组合,构成的图形犹如挂起来的一盏灯笼,深具民族风格^[45]。此次对于人民币中语言文字的调整既是工艺设计、布局规划的调整,更具有各民族紧密团结的美好象征,且为以后人民币版面设计改进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新形势,推动货币体系改进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于1987年4月27日开始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共计9种面额,14种版别。第四套人民币继续印制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五个民族文字。在具体文字布局上有所调整,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将第三套人民币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横向并列为六行改为横向排列为一行,从左至右依次为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旧),50元、100元则沿用第三套人民币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排列方式,但也作出相应调整,即将六行并列改为四行并列,从上到下依次为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旧)。

199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五套人民币,继续选用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五种民族文字,在具体布局中较第四套人民币有所调整。具体来说,对于壮文进行了调整,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壮文改革的成果,“中国人民银行”六字写法采用了新壮文。将第四套人民币中横向排列一行改为横向排列两行,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蒙古文、藏

文、维吾尔文、壮文,并且其位置亦有所变化,从第四套人民币处于纸币下方改为右上方,置于汉语拼音之下。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于2005年、2015年、2019年对于第五套人民币纸币进行调整,但均为防伪技术、水印、年号调整,并不涉及文字、人物、风景调整。至此,形成了五种民族文字并行印制格局,分别为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的“中国人民银行”。

表1 人民币币面民族文字演变

版别	发行时间	民族文字
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	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
第二套人民币	1955年3月1日	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
第三套人民币	1962年4月20日	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
第四套人民币	1987年4月27日	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
第五套人民币	1999年10月1日	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

纵观五套人民币的发行演变,民族平等团结是始终不变的主题。国家之所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各民族文字,而没有只是将通用汉字作为人民币的符号表征,充分体现着国家和人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想。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伊始,考虑到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人民的语言风俗习惯,就增印了蒙古文、维吾尔文,此后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后在所有版别印制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第三套人民币又增印了壮文(旧)。从此,人民币上印制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五种民族文字成为定制。国家认同的构建既依赖于国家建设的有序性和国家发展的人民性,也依赖于民众在与国家各层级相联系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制度民主性和价值合理性^[6]。

三、图案设计展现民族风情地貌

从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角度看,人民币是艺术作品,而由于形式受功能的牵引和限制,形式不能完全脱离功能,因此在图案设计方面充分展现民族地区风情地貌,旨在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从第一套人民币背面的瞻德城图、牧羊图、牧马图、骆驼图、蒙古包,第二套人民币的天安门、各民族大团结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两幅标语,到第三套人民币各族人民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再到第四套人民币高山族、满族、朝鲜族、土家族、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维吾尔族、彝族、藏族、回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人物头像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再到第五套人民币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头像与西湖、泰山、长江三峡、桂林山水、布达拉宫、人民大会堂等自然人文风景,这其中变化的是具体图案景观的选取,永恒的则是民族团结主题。

第一套人民币5元(牧羊版)、500元(瞻德城版)、1000元(牧马版)、5000元(骆驼版、牧羊版)、10000元(牧马版、骆驼版),背面图案为成群的羊群,草原中奔驰的骏马,沙漠结队的骆驼,家喻户晓的蒙古包,展现了民族地区的自然风景,展现了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尤其是500元币背后所绘制的瞻德城图,充分展示了维吾尔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瞻德城,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改察罕乌苏为瞻德,都司、守备驻之,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清水河镇^[7]。清朝乾隆年间平定伊犁,为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的统一,在伊犁地区新建了惠远城、拱宸城、绥定城、惠宁城、宁远城、塔勒奇城、广仁城、瞻德城、熙春城九城,史称伊犁九城。伊犁将军府与伊犁九城的修建对于加强新疆地区的统一,构建边疆边防战线,阻遏沙俄势力南扩意义重大,因而成为新疆地区的著名历史文化遗迹,承载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发展的历史。人民币印制瞻德城图案,体现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了各民族交往发展的悠久历史,彰显了党和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1元面额两种版本正面图案均为天安门,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主题。天安门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国家举行各种重大仪式庆典的场合,后来被选用为国徽的主题题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象征。5元面额两种版本均采用民族大团结的主题,一版为酱紫、橙黄色,一版为深棕、米黄色。纸币正面为各族人民相聚在天安门广场,手持两幅标语,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两版5元纸币在图案与标语中充分展现了民族大团结主题,人称“大团结5元币”。事实上,最初设计草稿为人群中高举毛泽东画像,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采用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将毛泽东画像修改为两幅标语,体现了毛泽东个人高风亮节的品格以及党和国家时时以全国各族人民利益为重的原则。

1962年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发行棕色伍元券和枣红色壹角券的通告》,决定于4月20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该套人民币于2000年7月1日停止流通,是迄今为止流通时间最久的一套人民币。1966年发行的10元票券,正面图案为各族人民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象征着各族人民参政议政、共商国是、当家作主、共谋发展。背面图案为天安门广场,并印有天安门水印防伪标识。这是我国自行设计、使用自己研制生产的印钞专用设备和固定水印钞票纸印制的,是我国印钞造币工业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新时期的重要标志^[9]。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制造充分展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主题。

第四套人民币在1967年1月就曾被提上日程,后来受“左”倾错误影响,设计发行数次被搁置。1987年4月27日所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正面使用民族人物头像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背面使用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图画。整套钞券设计与艺术由“文革”时期“红、光、亮”的构图模式到关注平常人物与普通生活场景和细腻人物肖像题材的转变发生了共鸣^[9]。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因此,拾圆券以下7种券别正面的人像是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审查,选取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民族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头像,反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象征各民族大团结^[10]。选取人口较多的13个少数民族作为第四套人民币印制图案,既避免了56个少数民族头像同时出现不利于版面设计,又充分展现了民族团结发展的主题。具体来说,1角纸币正面为高山族、满族男子头像,2角纸币正面为朝鲜族、土家族女子头像,5角正面为苗族、壮族女子头像,1元正面为侗族、瑶族女子头像,2元正面为

维吾尔族、彝族女子头像,5元正面为藏族女子、回族男子头像,10元正面为汉族、蒙古族男子头像。1至10元背面图案分别为八达岭长城、南天一柱、长江巫峡、珠穆朗玛峰。50元正面图案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头像,体现了生产、劳动、教育相结合的主题,背面为黄河壶口瀑布。100元正面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头像,背面为井冈山主峰图。整体而言,第四套人民币设计理念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主题,回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事业胜利的历史,彰显了改革开放后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面貌。

表2 第四套人民币图案

面额	100元	50元	10元	5元	2元	1元	5角	2角	1角
主景图案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头像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头像	汉族、蒙古族男子头像	藏族女子、回族男子头像	维吾尔族、彝族女子头像	侗族、瑶族女子头像	苗族、壮族女子头像	朝鲜族、土家族女子头像	高山族、满族男子头像
背面图案	井冈山	黄河壶口瀑布	珠穆朗玛峰	长江巫峡	南天一柱	八达岭长城	国徽	国徽	国徽

第五套人民币设计的主题图案有三种方案,分别为古代历史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毛泽东^[11]。最终经过反复考虑,第五套人民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采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画像。第五套人民币于1999年10月1日正式发行,共计8种面额。1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头像,背面为三潭印月。5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头像,背面为泰山。10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头像,背面为瞿塘关。20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头像,背面为桂林山水。50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画像,背面为布达拉宫。100元纸币正面为毛泽东画像,背面为人民大会堂。总体来看,正面均采用毛泽东画像,既符合了世界各国以开国领袖作为货币主题图案的惯例,又是对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中巨大功劳的肯定,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民族欣欣向荣、团结进取的面貌。在背面风景选取中,既有西湖、泰山、长江三峡、

桂林山水等壮美河山风景,更有布达拉宫、人民大会堂等历史人文景观,充分展现了祖国的历史文化,凸显了民族团结主题,弘扬了民族优秀文化。

图案相较于文字而言,在表达效果方面更具有直观性、审美性、联想性,给人在视觉方面以强大的冲击效果。人物、服饰、名胜是各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人民币在图案设计中充分展现民族地区风情地貌,置于国家语境下的图案设计,其主要功用不再是艺术价值,而是其象征价值,特定民族图案的直接使用将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纵观五套人民币的图案版面设计,无论是纸币正面的人物设计,还是背面风景的选取,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的体现,也有各民族文化的兼顾。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国家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刻内涵的四个方面。人民币票面图案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传承的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各民族风情地貌和中华灿烂文化。

四、结语

习近平指出:“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2]人民币是国家符号象征,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壮美瑰丽的自然风光。其以各族人民对于国家体制与发行机构的信任为核心,以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为根本,在展现货币本身艺术魅力的同时,彰显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增进了民族交流与民族认同。

人民币作为权力的表征,是国家促进各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主动选择和有效工具,是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的主动选择和有效工具。民族文字的印制与币面图案的选取调整,充分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社会风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纸币票面主题意义与含义

不断丰富发展,人民币在国家与民族的互动中建构着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必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90.
- [2]方华,史册.参考的启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2.
- [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02).
- [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3-1955):第2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 [5]陈宝山,鄂大地.人民币印制民族文字的演进[J].中国钱币,1995(2).
- [6]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 [7]傅林祥,林涓.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01.
- [8]马继刚.中外货币防伪特征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37.
- [9]顾惠.“国家符号”上的艺术形象[J].艺术市场,2010(8).
- [10]当代中国印钞造币志编纂委员会.当代中国印钞造币志(1948-2000):上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66.
- [11]梁建.人民币与新中国同行[J].金融博览(财富),2018(11).
- [12]习近平“下团组”金句点亮2018年两会[EB/OL].(2018-03-10)[2020-01-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4533884981895052>.

责任编辑:潘宏纹

ISSN1674-1730
CN62-1197/G4

LONGDONG XUEYUAN XUEBAO

陇东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2020 **1**

第31卷 总第123期

陇东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31 卷/第 1 期/总第 123 期/2020 年 1 月出版

【语言·文学】

-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的拟声词 赵绒绒/01
-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网络热词的英译 胡殿龙/06
- “模糊”的取与舍
- 从葛浩文译本看《丰乳肥臀》中模糊语言翻译 吴红敏/11
- 翻译软件的使用对二语写作中词汇运用的影响
- 以英语专业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为例 颜志蓉, 陆 瑶/15
- 世界英语变体理论及对二语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李盛曦/20
- 清代词学理论与诗教传统的矛盾与融合
- 以知人论世在“词史”理论构建中的应用为例 高 媛/26

【历史·文化】

- 隋朝行宫与离宫考论 司豪强/31
- 南宋绍兴和议前后学士院职能的变化及其影响 李 垚/38
- 蒙元时期赐名号问题研究 智苛苛/44
- 不失天朝体制
- 略论清朝前期澳葡地区的司法管理 刘旭康/50
- 《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献疑九则 于宏伟/54

《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献疑九则

于宏伟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主要记述了孙中山从1906年1月至1911年12月之间的革命活动轨迹与重要言论。现结合《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等多种史料,对《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进行考证,勘正其中九处疑误。九处均为时间、地点、人名细节之处错讹,通过认真考证校订,核其是非,以此保证该资料的准确性。

关键词:《孙中山史事编年》;疑误;校勘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20)01-0054-05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于宏伟(1994—),男,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研究。

桑兵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已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8月出版,该著作非常全面、翔实、系统地记述了孙中山的生平事迹与活动,是目前孙中山革命及思想研究的高水准著作和最新成果。《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主要记述了孙中山从1906年1月至1911年12月之间的革命活动轨迹与重要言论。

一、1907年6月24日(五月十五日)条

载:安徽巡抚恩铭飭属严防革命党举事^{[1]580}。按:此处(五月十五日)误,当为五月十四日,理由如下。

本章节6月22日(五月十二日)条言6月22日为五月十二日,则6月24日当为五月十四日。6月25日(五月十五日)条言6月25日为五月十五日,则6月24日当为五月十四日。查《申报》1907年第12276号第十版《皖抚慎重江防》,当日为1907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又查万年历得1907年6月24日为丁未羊年五月十四日,因此本条五月十五日当改为五月十四日。

二、1907年12月23日(十一月十九日)条

载:致函张永福,托转交致沈胜芳、陈梦桃信件,促汇款以应军需。同函还介绍镇南关之役及其后攻取情况^{[1]624}。按:此处沈胜芳误录,当改为沈联芳,理由如下。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致张永福函》载:永福我

兄阁下:兹有寄沈联芳、陈梦桃二君之信,望费神交去^{[2]352}。《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一卷《胡汉民致孙中山函》1910年12月30日,星洲惟沈联芳出银千,陈先进出银千,祯祥五百,余俱小数,大约不过四千元。合以芙蓉、霹雳等处,约万一二千^[3]。《革命逸史》对于沈联芳参与革命事务及募捐经费等活动有多处记载。其中《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姓名表》陈楚楠、赵金鼎、李肇基……沈联芳、丘继显、林希侠……方云藻、徐统雄^{[4]1126}。又言:《图南报》既歇业,陈、张复于乙巳秋间联络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诸人创设《南洋总汇报》以为之继,东京《民报》且为之登报介绍焉^{[4]1129}。又见《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载:汉民、泽如等到星洲,于十月二十四日在晚晴园开会,党员到者有周之贞、沈联芳、卢礼明、李孝章、陆秋露等百余人,合得捐款三千元,中以沈联芳首捐一千元为最巨^{[4]1140}。《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陈张复于乙巳秋间联络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诸人创设南洋总汇报^[5]。《黄兴集》云: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泽如先生大鉴:昨上一函,想已入览矣。顷又得伯先兄来电,言需款甚急,已请沈联芳兄电去二千。(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6]《孙中山年谱长编》1907年12月23日(十一月十九日)条言:致函张永福,托转交致沈联芳、陈梦桃信件,促汇款以应军需。同函还介绍镇南关之役及其后攻取情况^{[7]418-419}。

桑兵教授所著《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言:11月10日,在陈楚楠、张永福、沈联芳、陈嘉庚、陈子纓、陈

先进、何德如等人的赞助下,举行第二次群众募捐大会,到会者达1000多人,由广府、福建、潮州、海南等社区的代表领袖依次发表演说,听众随时自由捐款50元至500元不等,一张孙中山的照片售价可达450元。除当场收到数千元捐款外,还决定成立正式的募捐委员会^[8]。另外,本卷1907年12月23日(十一月十九日)条后面又载“兹有寄沈联芳、陈梦桃二君之信,望费神交去。闻雪秋兄言,二君允肯捐助义款,惟须得弟言为征,故作书与之。”此记载与条目标题相矛盾,亦可佐证沈胜芳记载有误,因此,当改为沈联芳。

三、1907年12月21日(十一月十七日)条

1908年4月22日(三月二十二日)条

载:汪精卫、邓子瑜赴英属挂罗庇胜埠成立同盟会分会,以邓泽如为分会会长^{[1]624}。函告挂罗庇胜埠同志目前边境形势,催促筹款^{[1]633}。按:此处挂罗庇胜埠当改为挂罗庇勝埠,理由如下。

《国父年谱》民国四年3月9日条言:泽如偕许、宋等,直往巴罗,数日之间,晤区慎刚、郑螺生等,遍历高烟、巴里、沙叻、吉隆坡、芙蓉、挂罗庇勝、麻六甲、新加坡诸埠,许、宋并往荷属诸埠^{[9]540}。11月12日条载:邓泽如偕崇智、邓铿往挂罗庇勝^{[9]559}。《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革命开国》言:挂罗庇勝同盟会分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汪兆铭、邓子瑜前来组成,推邓泽如为会长^[1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言:12月21日条言:英属挂罗庇勝埠同盟会分会成立,由邓泽如任会长。本日,汪兆铭、邓子瑜到达英属挂罗庇勝埠组织同盟会分会,由邓泽如任分会会长^[11]。《清史》卷五百四十七《革命党人列传一》:十七日,英属挂罗庇勝埠同盟会分会成立。邓泽如为会长^[12]。《孙中山年谱长编》1908年4月22日(三月二十二日)条言:致函挂罗庇胜埠同志,告目前边境形势,促筹款应急^{[7]429}。

事实上,《孙中山史事编年》1908年4月22日(三月二十二日)条在末尾注明其主要参考文献为《孙中山全集》。查阅《孙中山全集》第1卷《致挂罗庇勝同盟会员函》章节,其中均作挂罗庇勝而非挂罗庇胜^{[2]365}。而《孙中山全集》该部分主要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所编,翻阅《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之《钦廉之役,总理函告两通》,其亦言挂罗庇勝^[13]。另外,《孙中山史事编年》一书除了此两条作挂罗庇胜以外,1909年11月22日条却作挂罗庇勝^{[1]757}。因此,此处挂罗庇胜埠当为因字形相近而

误录,应改为挂罗庇勝埠。

四、1909年1月28日(正月初八日)条

载:《中兴日报》于28日、29日连载胡汉民所撰《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称“革命报其以开通民智为己任,保皇报乃以闭塞民智为己任而已。”(《中兴日报》1909年1月28日、29日,“论说”)^{[1]719}按:此处正月初八日误,当为正月初七日,理由如下:

关于正月初八日之误。1909年1月23日(己酉年正月初二日)条言:陶成章与“中山私人”汤伯令同赴霸罗募款^{[1]718}。1月23日既为正月初二日,则1月28日应为正月初七日。又1909年1月29日(己酉年正月初八日)条言: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致电外务部,告严防革命党由美运炸药^{[1]719}。1月29日为正月初八日,则1月28日当为正月初七日。另查万年历1909年1月28日确为己酉年正月初七日,此处有误矣。

五、1909年12月31日(十一月十九日)条

载:当晚与会者,除孙外,尚有十二人,包括周超、吴朝晋、李铁夫、赵公璧、谭赞、吴赞、马兆、黄溪记夫妇及其义子某,以及梁添^{[1]766}。按:此处黄溪记夫妇有误,当为黄溪夫妇。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载:据我所知,当时就有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在纽约开设面厂的黄溪夫妇、鹤山人画家李铁夫、新会人赵公璧、吴朝晋和周超等人。他们以黄溪为首,正在酝酿在纽约组织同盟会^[14]。《孙中山年谱长编》言:纽约华侨黄溪等筹组同盟会,适逢先生来纽约,即决定在除夕之夜假座黄溪家中请先生亲临主持该会成立的开幕仪式。《广东文史资料第52辑》言:据我所知,当时就有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在纽约开设面厂的黄溪夫妇、鹤山人画家李铁夫、新会人赵公璧、吴朝晋和周超等人^[15]。《广东文史资料精编》载: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人有:周超(开平人,是在纽约专招呼接引华侨来往美洲各埠做翻译的)、吴朝晋(新会人,是与我一起开设餐馆的)、李铁夫(鹤山人,画家)、赵公璧(新会人,开杂货店的)、谭赞(新会人,开设面厂的)、吴赞(新会人,开洗衣店的)、马兆(台山人,开洗衣店的)和黄溪夫妇与他们的义子某某(开洗衣店的)及我,另一位的名字已记不起了^[16]。

另外,《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1909年12月31日(十一月十九日)条前面所言:本年冬,适逢先生来纽约,即决定在西历除夕之夜,即12月31日,假座

黄溪家中请其亲临主持同盟会纽约分会成立的开幕仪式^{[1]765}。与随后所载的黄溪记夫妇前后矛盾,亦可证明其记载有误。

六、1910年3月1日(正月二十一日)条

载:函告赵公璧,旧金山情势与活动计划,并望筹款作旅费^{[1]781}。按:正月二十一日当改为正月二十日。理由如下:《孙中山全集》卷一《复赵公璧函》及《致邓泽如等函》均为孙中山在1910年3月1日发出的信函,且文尾时间落款为庚戌年正月二十日,而非正月二十一日^{[2]446}。《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选编》之《复赵公璧函》时间同样记载为正月二十日。《从晚清到民国》载:据中山先生于1910年3月1日(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5000,而“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5000,所寄不过1900余元^[17]”。另据《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2月28日(正月十九日)条:出席旧金山同盟会分会的成立会,并演讲革命问题^{[7]483}。1910年2月28日为正月十九日,且1910年为平年,2月无29日,则3月1日即为正月二十日。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可查万年历,1910年3月1日为农历庚戌年正月二十日,此处当改。

七、1910年11月13日(十月十二日)条

载:与会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庇能黄金庆、吴世荣、林世安、怡保李孝章、芙蓉邓泽如、刊甸李义侠等^{[1]831}。按:该条问题有二,一是其注明资料来源于《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38页与《中国国民党史稿》798页,但是通过查阅上述著作,虽对此次与会的人员做了介绍,但均未提及“刊甸李义侠”与会之事,编者应当对资料来源予以补充详证。二是此处刊甸李义侠有误当为坤甸李义侠。

革命党人林凤文在中华民国三十九年(1950)三月廿九日革命先烈纪念日撰写的《黄冈革命史迹》一书中言:如槟榔屿吴世荣、黄金庆、丘明昶……坤甸李义侠(春荣)、李文安……等,均本其革命维新、扶汉覆满精神,闻风兴起,先后创设中国革命同盟分会,竞相号召,宗旨不约而同。洵有天与人归之象,向称国中逋逃藪,素号为保皇党天下之南洋,遂一变而为革命党大本营、司令台,复兴中华民族之革命策源地,而我华侨得占数千年民族革命史上,最轰轰烈烈光荣辉煌伟大之一页!^[18]《孙中山与福建》载:(孙中山)于11月13日召集同盟会核心领导和南洋华侨革命骨干的秘密会议,到会的有黄兴、赵声、胡汉

民等与庇能吴世荣、黄金庆、林世安、怡保的李孝章、芙蓉的邓泽如、坤甸的李义侠等南洋闽粤籍侨领同盟会骨干^[19]。《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认为:与会者共53人,除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外,华侨代表有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此4人为檳城南洋支部代表)、李孝章(怡保分会代表)、邓泽如(芙蓉分会代表)、李义侠(坤甸代表)、李柱中(即李燮和,印尼代表)等多人^[20]。《孙中山在槟榔屿》书中言:会议是于1910年11月13日(星期日,阴历10月12日)在他位于柑仔园404号的寓所召开,出席者包括:孙中山会议主席、黄兴、胡汉民……李义侠坤甸分部^[21]。《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载:参加者有南洋支部的代表吴世荣、黄金庆、怡保分会的代表李孝章,芙蓉分会的代表邓泽如和坤甸的代表李义侠以及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等^[22]。《广东民国史》载: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骨干及庇能黄金庆、吴世荣、林世安、怡保李孝章,芙蓉邓泽如,坤甸李义侠等^[23]。

除此以外,张同新所著《辛亥革命史纲》、杜永镇所著《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郑彭年所著《孙中山与宋庆龄》、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等皆作“坤甸李义侠”。事实上,所谓坤甸与刊甸,实则是印度尼西亚城市 Pontianak 的音译,但是检阅史料不论是民国亦或是当代, Pontianak 均被译作坤甸而无刊甸一说,1910年11月13日(十月十二日)条应从坤甸李义侠。

八、1911年1月18日(十二月十八日)条

载:黄兴又令罗炽扬负责惠州方面布置。“其时本部重要同志悉数来港,会议结果,分为两种任务,一统筹部分分科办事;一长江上下游谋发动应援,陈英士、宋纯初、谭人凤、居正等皆受约束而行。”^{[1]841}按:此处宋纯初有误,当为宋钝初。其理由如下:《胡汉民自传》言:其时本部重要同志悉数来港,会议结果,分为两种任务:一就统筹部分分科办事;一于长江上下游谋发动应援;陈英士、宋钝初、谭人凤(按即谭人凤)、居觉生等皆受约束而行^[24]。《孙中山年谱长编》1911年8月4日(闰六月初十日)条载:“其时本部重要同志悉数来港,会议结果,分为两种任务,一统筹部分分科办事;一长江上下游谋发动应援,陈英士、宋钝初、谭人凤、居正等皆受约束而行。”^{[7]523}《文明国编》言:先是,陈英士(其美)、宋钝初(教仁)、谭石屏(人凤)、居觉生(正)等既受香港军事机

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25]。事实上,无论是纯初亦是钝初此处均指代的是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逝世之后,姚光作《哭宋钝初先生文》以及1919年其夫人方氏逝世后民国政府发布的《宋钝初夫人方氏讣告》均使用的是钝初而非纯初。《宋教仁集》言:宋教仁,字逐初(亦作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26]。据此可知,1911年1月18日(十二月十八日)条所言,“陈英士、宋纯初、谭人凤、居正等皆受约束而行。”确凿有误,疑为笔画相近误录。

九、1911年8月4日(闰六月初十日)条

载:四川党人刘鸣剑、王天杰等,联合哥老会首领,成立保路同志军,发动反清起义^{[1]883}。按:此处四川党人刘鸣剑当改为龙鸣剑。理由如下:《荣县县志》卷二十九《人物》载:龙鸣剑(1877—1911),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别号雪眉。闰六月初十(8月4日)以秦载赓名义,召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聚资中罗泉井,商定全省起义方略。七月十五(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27]《吴玉章回忆录》第一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言:例如龙鸣剑和王天杰(子襄)等同盟会员,一开始就看透了蒲殿俊等立宪党人的本质,知道他们不敢触及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因而除与他们进行共同合法斗争外,又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8月初,龙鸣剑、王天杰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于资州举行会议,根据龙鸣剑提出的“明同暗斗”的方针,决定组织同志军,反动武装斗争^[28]。《孙中山年谱长编》1911年8月4日(闰六月初十日)条载:四川党人龙鸣剑、王天杰等,联合哥老会首领,成立保路同志军,发动反清起义^{[7]543}。《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载:龙鸣剑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8月与王天杰等在资州(治今资中)决定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29]。《内江文史:“辛亥革命与内江”专辑》载: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初期,龙鸣剑发展川西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等加入同盟会。8月4日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秘密联络会党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攒堂大会”(即罗泉井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商议于阴历七月底举行武装起义^[30]。

除此以外,下述资料误将龙鸣剑作龙剑鸣,但是其指代的是龙鸣剑本人。

《三台文史资料选辑》载:辛亥秋,革命党同盟会

员龙剑鸣,帮助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成立保路同志军掀起武装暴动,各府州县分会先后共组合数十万人到成都响应^{[31]120}。龙剑鸣等又联络会党同盟会员熊克武、杨兆蓉、朱淑痴等组成保路同志军讲攻^{[31]121}。《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5日第8版《记川西保路同志军起义》言:1911年8月上旬,王天杰、龙剑鸣、秦载赓、罗子舟等人在资中秘密开会,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刘伯承传》言:吴玉章、龙剑鸣、王天杰等革命党人先后在荣县、内江起义^[32]。《重庆辛亥革命史》载:朱之洪到成都以后,秘密与在省党人曹笃、龙剑鸣等人商议进行革命的办法^[33]。《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载:为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同盟会会员龙剑鸣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会同同盟会会员朱国深、曹笃等人,在农场工人协助下,裁制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34]。综上可知,1911年8月4日(闰六月初十日)条将龙鸣剑载为刘鸣剑确实有误矣。

十、结语

《孙中山史事编年》全面梳理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资料,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编排记载了孙中山的活动言行,并且对于直接或间接相关人物、事件已有所记载。该著作凝聚着编著者的心血,充分体现了编者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今翻阅《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二卷,发现其中存在九处疑似错误,谨以其他史料文献予以考证论述。但是此九处错误丝毫不影响该著作的学术价值与编著水平,以故谨作此文,“《孙中山史事编年》卷二献疑九则”,限于自身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桑兵. 孙中山史事编年. 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 桑兵. 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4.
- [4] 冯自由. 革命逸史下[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
- [5] 冯自由.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121.
- [6]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黄兴集[M]. 北京: 中华书

- 局,1981:30.
- [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8]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1.
- [9]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国父年谱上册[M].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出版,1965.
- [10]“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M].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85:336.
- [1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1981:803.
- [12]张其昀等编.清史[M].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1971:6184.
- [13]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M].南京:正中书局,1947:11-12.
- [14]严昌洪.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六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367.
- [15]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52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
- [16]广东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精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9.
- [17]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387.
- [18]汕头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汕头文史[M].揭阳:揭阳县印刷厂,1991:18-19.
- [19]戴学稷,陈孝华主编.孙中山与福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65.
- [20]任贵祥,吴北战.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J].广东社会科学,1997(4):103.
- [21]邱思妮著,陈耀宗译.孙中山在槟榔屿[M].北京:国家图书馆,2008:50.
- [22]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295.
- [23]丁身尊.广东民国史.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8.
- [24]胡汉民著.《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41.
- [25]孙中山.文明国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523.
- [26]陈旭麓.宋教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5.
- [27]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荣县县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571.
- [28]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66.
- [29]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99.
- [30]内江市文史资料汇编.内江文史:“辛亥革命与内江”专辑[M].内江:内江日报印制厂,2011:249.
- [31]三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M].三台:三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印,1987.
- [32]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8.
- [33]周勇.重庆辛亥革命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05.
- [34]金冲及.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78.

【责任编辑 杨晓芳】

Nine Errors about *Annals of Sun Yat-sen's Historical Events Volume II*

YU Hong-wei

(Nor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Abstract: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Annals of Sun Yat-sen's Historical Events* mainly describes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important remarks from January 1906 to December 1911. Based 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un yat-sen, the chronicle of sun yat-sen,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chronicle of sun yat-sen's historical events is verified, and nine errors are corrected. They are all errors in the details of time, place and person names. Through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and revision, they are verified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Key words: *Annals of Sun Yat-sen's Historical Events*; doubts and mistakes; collation

2020 07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学报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入库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HEILONGJIANG JIAOSHI FAZHAN XUEYUAN XUEBAO

(月 刊)

关于《食品工程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张 欣,王 彤,于殿宇 52

高职园地

新时期提升高职大学生职业素养的策略研究

秦永亭,李广智,张冬梅 55

媒介素养视域下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殷好好,严宏伟 58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调查与培养研究

杨 波,刘爱民,谭 阳 61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 娟,罗贵萍 65

基础教育

成就、问题与挑战:浙江省新高考改革试点的实践与思考

刘兰辉 68

高考设立初期历史试题评述(1952—1965)

于宏伟 72

陈鹤琴幼教思想价值性研究

冯 君 76

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现状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崔立华 79

新时期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思考

姜玉华 82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于 洋 85

浅析幼儿园绘本阅读的三个层次

陈闽光 88

德育·心理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途径

李佳昕 91

立德树人背景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能量”的研究

侯 超,马 娟 94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王 蓉 97

学生网络思政工作中的舆情研究

魏学庆 100

高考设立初期历史试题评述(1952—1965)

于宏伟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即着手对旧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从各高校自主招生,到各大区联合招生最终形成了国家主导的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制度。1952—1965年这十四年高考属于高考制度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高考历史试题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特有属性:题型简单,题目数量少;革命史观一家独大;直接式基础知识考查;考查内容“厚今薄古”与以“政治史为主”;重视社会变革与联系现实。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当时高考历史试题也存在着知识覆盖不够全面与个别题目不够规范的不足。通过对于过去高考历史试题的梳理与回顾,对于在新阶段开展新课标课程改革、高考命题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高考;历史试题;评述

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8531(2020)07-0072-04

一、高考统一命题的出现

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对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招生方式等做了总体规定。为了高校招生工作能够实现平稳的过渡,当时的中央政府提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但是当年的招生状况并不如人意,由于采取的是高校自主招生,故而许多学生多次报考,学校重复录取,最终导致大部分学校的报录比很低。高的能有75%,低的仅有20%^[1]。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在这份规定中对于高考考试和放榜的时间做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各大行政区在辖区内实现局部或全部高校联合招生^[2]。由于各大区及高校协调不一致,全国201所公、私立高等学校中仅有73所学校实行联合招生。但是毕竟部分高校联合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录取混乱的局面,一部分学校的生源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总结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195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1951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其中既沿用了1950年招生规定的主要内容,同时又在一定程度做了新的补充。即“为进一步改正各校自行招生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争取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统一或联合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日期;如有困难,仍允许各校单独招生;在其他地区招生时应尽量采取委托的方法进行”^[3]。结果当年招生规模迅速扩大,招生工作也较为有序,但是由于东北、西北地区较为偏僻,各大行政区生源不平

衡的问题仍旧存在,同时缺乏必要的生源调剂政策。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相结合的招生办法。至此,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制度正式建立^[4]。

1952—1965年之间,虽然具体高考日期和招生规模、科目有所调整,但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与分省录取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始终没变,历史作为必考科目始终存在。本文就1952—1965年的高考历史试题的总体特点、瑕疵不足作以分析,通过对过去试题的评述进而为新形势下高考命题及高中教学提供借鉴。

二、十四年高考历史试题的主要特点

(一) 题型简单,题目数量少

1952—1965年的高考历史试题主要的题型有填空、名词解释(或名词解释与列举)、简答(问答)、改错。一般每年试题数量有两到三个,而且每年都趋于稳定。

表1

年份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1952	填空	改错	名词解释	
1953	填空	简答		
1954	简答	填空		
1955	简答	填空		
1956	填空	简答		
1957	填空	改错	名词解释	简答

收稿日期:2019-09-04

作者简介:于宏伟(1994—),男,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研究。

续表

年份	第一题	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1958	填空	简答		
1959	填空	改错	简答	
1960	填空	简答		
1961	填空	简答		
1962	填空	简答		
1963	填空	名词解释与列举	简答	
1964	填空	名词解释与列举	简答	
1965	填空	简答	问答	

总的来说,这十四年高考历史命题尚未形成稳定的题型结构,出题比较随意,基本以填空、简答为主,有的年份如1954、1955甚至直接先考简答后考填空,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不符合考生答题规律,造成一部分考生在前面的简答题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没有时间作答填空题。总体来说,这十四年,试题题型简单而且变化幅度不大,既反映了缺乏前人经验可供借鉴的问题,又体现了命题者自身探索、力求试题结构完善的精神。

(二)革命史观一家独大

纵观这十四年的历史高考命题,无论题型、题目数量、考点变化,始终不变的是背后的革命史观。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这十四年高考命题均是在该种史观指导下命制,尤其以简答题最为明显。比如1953年的两道问答题分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它对以后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有何重大影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有什么根本不同?”1954年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它的经过大概怎样?它有什么世界意义?”1955年的是“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一运动起了什么重大作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这一革命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是什么?”1956年的是“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里,提出了什么样的土地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为什么不能实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地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基本原因是什么?”“1958年的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哪年发表的?是在怎样情况下发表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高考历史试题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考查的题目全部带有阶级斗争色彩,革命史观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了解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对于过去剥削制度、列强侵华、反动政府的统治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但同时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不利于学生的历史素养提高。

(三)直接式基础知识考查

无论哪一年的客观试题(填空、改错)在考察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基本上采用直问直答的方式。

全部围绕“谁在哪年做了哪件事”展开考察。下面以1952年为例予以呈现。

表2

年份	填空题	改错题
1952	1.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是?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是? 2.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的三大政策是? 3. 《南京条约》把? 割让给英国 4. ? 为了获得帝国主义支持,向五国借款。 5.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了? 6. 人文主义的传播有助于推动? 7. ? 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8.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有?	1. 商鞅变法发生在? 在位时期,王安石变法发生于? 朝,杨炎创立了? ? 创立了一条鞭法。 2. 五卅运动是由? 枪杀顾正红引起的。 3. ? 领导了戊戌变法。 4. 《天朝田亩制度》由? 颁布。 5. 古书上大秦指的是? 6. 十五、十六世纪东方对外主要销售? 7.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是? 8. ? 发现了新大陆,? 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

其实不只是客观题采取直问直答的方式,主观简答题也是如此,比如遵义会议的意义,明治维新的内容及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武昌起义的经过和辛亥革命的意义,简述马关条约,简述一二·九运动等等。这些题型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以及对课本内容的熟练程度。这些题几乎能够从课本上找到答案,这种命题方式主要与当时的教学大纲有关,即“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非常注重基础知识考查的命题方式有利于统一评分标准,同时可以引导学生熟悉课本,加强对基础知识的记忆,最终有利于对历史事件、历史发展的认识,但也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开放作答。

(四)考查内容“厚今薄古”与以“政治史为主”

这十四年高考历史命题虽然对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都有所涉及,但是事实上中国古代史所占比重很少,世界古代史基本没有,而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比重很高,为了更清楚地展现各年试题各模块所占比重,下面以表格的形式予以呈现。

1952—1965年高考历史试题各模块

表3 所占卷面总分百分比

年份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现代史
1952	29.23%	33.85%	0%	36.92%
1953	22.00%	50.00%	4.00%	24.00%
1954	32.65%	30.61%	0%	36.73%
1955	8.00%	56.00%	0%	36.00%
1956	12.00%	46.00%	0%	36.00%
1957	10.00%	48.00%	0%	42.00%
1958	6.00%	48.00%	0%	26.00%
1959	21.74%	52.17%	0%	26.09%
1960	21.74%	42.61%	0%	35.65%
1961	24.29%	38.57%	0%	37.14%

续表

年份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现代史
1962	25.71%	38.57%	1.43%	34.29%
1963	18.00%	41.00%	4.00%	37.00%
1964	14.00%	44.00%	6.00%	36.00%
1965	16.00%	84.00%	0%	0%

注:部分年份有选考题,针对这种情况,采用将所有试题分数之和作为卷面分数,故而有些年份卷面分超出100,再用涉及到的模块除以卷面分数,所占比例不变。

从表格中我们能够看出近现代史的内容远大于古代史的内容,其中又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世界古代史几乎没有,仅1953、1962、1963年有所涉及,且比例极低。世界近现代史占比基本维持在35.00%左右,但是1965年则为0%。这是就古今中外划分而言的,如果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来划分的话,内容最多的当属政治史。政治史里面出现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考点,即历次农民起义(25次)、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战争(54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33次)、历次列强侵华战争(23次)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受传统革命思维和国际环境影响较大,因而在高考命题中对于近现代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内容涉及的自然较多。除此以外,20世纪50年代中期,史学界掀起了关于农民战争、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热潮,史称“五朵金花”,高中历史教学虽然并未直接参与,但是势必受到当时史学研究的影响,所以历次农民起义就成为了高频考点。

(五)重视社会变革与联系现实

这十四年试题在考察过程中非常注重对涉及到社会变革的事件进行考察,比如说历史上的改革,如商鞅变法、王莽改制、一条鞭法、两税法、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等。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先后出现在1952年第二大题第1题,1953年第一大题第3小题,1954年第二大题第3小题,1961年第一大题第5小题。尽管命题的导向是让学生明白变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但是也反映了命题者关注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注重变革维新对于历史发展作用的特点。

除了对社会变革事件人物着重考查以外,这十四年试题的最大亮点就是加强与现实的联系,如【1956年第一大题第4小题】1953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号召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成()而奋斗。在这一年的高考历史科目中,居然考察了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道题既属于现代史范围,也是时事政治题,反映了命题者关注现实的倾向。而1956年当时正处在三大改造的后期,这道题出的可谓是恰逢其时。【1963年第三大题第13小题】()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3年第三大题第1小题】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路线、经过和成果,并说明土地改革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这些题都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考查,展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建设成就。对于国际热点时事政治,命题者也十分关

注。如【1960年第一大题第15小题】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人民收复了法军在越南北部最重要的据点(),歼灭了法军一万六千余人,标志着法国侵略军在越南的彻底失败。【1961年第一大题第19小题】1954年4月到7月,中、苏、美、法、英和其他有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就()和平问题达成协议。【1961年第一大题第20小题】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1962年第一大题第20小题】1957年11月,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

这些题的出现,都是当时国际政治的大事、新事,命题者并不回避热点,而是十分关注,反映了命题者对于现实与历史的认识,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变化相统一起来,同时这种命题导向有利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新闻,拓宽自身的视野。

三、十四年高考历史试题之不足

(一)知识覆盖不够全面

前面已经说到,这十四年高考命题存在“厚今薄古”与以“政治史为主”的倾向,这固然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命题的一个不足,那就是知识覆盖不够全面。高考作为全国统一的选拔性考试,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命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客观反映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否有效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大学中。而这十四年高考命题非常侧重对于中外近现代史的考查,固然对于弘扬传统革命精神,理解新中国建立不易有很大作用,但是我国在古代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财富,比如长城的修建、大运河的开凿、各类史书典籍、各类农医技术书籍、各类服饰美食、儒释道等百家文化等等,这些东西并非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化,而是代表了我国古代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因此,在高考命题过程中不应当忽视,毕竟农民革命战争替代不了整个古代历史。通过高考题的方式将古代文化予以呈现,有利于促进学生了解古代文化,更清楚地把握历史规律,凝聚民族自信心,更好地传承历史。

(二)个别题目不够规范

【1952年第一大题第3小题】清政府一八四二年在与英国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的《南京条约》里,把()割让给英国。该题答案给的是香港,其实更准确的是香港岛,因为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南京条约》只是把香港岛割让出去,九龙半岛、新界是后来租借出去的。

【1953年第一大题第8小题】平型关大战发生于()年,在()省北部,平型关东南公路两边痛歼日寇三千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1962年第一大题第13小题】1937年9月,八路军在()歼灭日本侵略军三千多人,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这两道题都考查了平型关大捷,但是关于八路军歼敌数量不够准确,两道题都采用了歼敌三千人的说法,但是《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

中记载:(9月25日)下午4时,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师主力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你们独立团已胜利完成了打援任务^[5]。除此以外,金一南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考证为1000余人。其实高考命题者之所以采用歼敌三千余人的说法,一方面是当时战场形势紧迫,各团上报人数不一,很难做出有效统计;另一方面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宣传歼敌三千余人有利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1954年第二大题第2小题】我们祖国的疆土早在公元前2世纪()帝国时代已经大体奠定。这里考察的是秦朝对于我国疆域版图的影响,但是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属于公元前3世纪,而非前2世纪,命题者此处将时间弄错。

【1955年第二大题第1小题】世界上最先发明用破布、麻头等植物纤维做造纸原料的是我国()时期的()。这里考的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但是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掌握造纸技术,而蔡伦被认为是改善了造纸术。

【1957年第一大题第7小题】鸦片战争以后,军阀官僚办洋务的重心放在()方面,他们的目的是扩张自己势力,维持封建统治。此处的鸦片战争应当改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开始以后,前期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用来镇压天平天国。

除此以外,个别题目的书写也不够规范,比如涉及到具

体年份,有的写成一九三七年,有的写1842年,阿拉伯数字与汉字书写没能统一,还有个别的题目表述语言重复或太过简要,不方便考生理解作答。

四、结束语

1952—1965这十四年高考时期是我国高考发展的探索阶段,尽管其中的历史试题有些许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对于选拔人才和促进教育发展方面的重大作用。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教育层面又推行了新一轮更为深入全面的改革,我们通过对于1952—1965这十四年高考历史试题的回顾总结,能够发现更多新问题,探索出新方法,对于更深入地推进改革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0.
- [2]高等教育部办公厅.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年)[M].1958:118.
- [3]方晓东,程斯辉.高校招生考试问题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55.
- [4]应望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1978~2008[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70.
- [5]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261.

Comments on History Examination Ques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1952—1965)

YU Hong-wei

(Nor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began to reform the old enrollment system. From independent enrollment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joint enrollment by regions, a national unified exam enrollment system led by the state was finally formed. The 14-yea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1952 to 1965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is period, the history 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w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simple questions and small number of questions; revolutionary conception of history alone; direct examination of basic knowledge; examination content "being profound in the present and weak in the past" and "focusing on political histor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ocial change and connecting with realit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conditions, the history 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t that time also have the defects of insufficient knowledge coverage and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individual questions. Through combing and reviewing the past history examination question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carry out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new stage.

Key words: new China;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istory examination question; comment

(责任编辑:刘东旭)